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停火破裂，叙战局重回胶着

□ 李子昕

在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前夕，美俄两国在日内瓦达成协议，就叙利亚停火事宜取得一致。此次停火对于饱经战乱的叙利亚国家及民众而言都难能可贵。双方承诺，若停火协议顺利实施，将加强军事合作，特别是将联手打击叙利亚境内包括“伊斯兰国”（IS）在内的极端势力。由于美国此前拒绝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就在叙境内打击极端势力的活动展开接触，其所领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一直在伊拉克境内展开空袭行动。俄罗斯受叙利亚政府之邀在叙境内展开武装行动，但俄美两国鲜有对打击极端组织的有效合作。这种局面为肆意穿梭于两国边境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此次美俄两国就在叙境内打击极端组织达成一致，国际社会本寄予极高的期待，希望相关协议能为地区局势展开新的篇章。

孱弱停火转瞬即灭

事实上，此次停火若能按预期实现，亦有利于美俄为今后介入叙利亚政治版图铺平道路。为实现政治权力重构，首要便是约束各方的军事力量。目前叙内战呈代理人模式，各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域外大国必须有效管控各自“盟友”，才能实现叙局势一时的安宁。尽管这样的政治安排充满大国强权的意味，但这恰是中东的政治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勉强的和平最终都未能如期实现。在停火协议达成仅一周之后，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东部展开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一处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叙利亚政府军基地，导致62名叙政府军丧生。事后，美俄两国就此相互展开激烈指责。作为回应，叙政府军对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攻势全面升级，停火协议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愈发剑拔弩张。

代理人战争愈发固化

在俄罗斯的武装协助下，叙政府军对阿勒颇展开的收复行动主要是针对盘踞于此的反对派。在阿萨德政府眼中，武装反对派与恐怖组织并无差别，并同样在内战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这些武装派别所代表的势力，与阿萨德家族所属的派别信仰有异，利益相左，彼此间是生死存亡的较量。近一年来，俄罗斯的介入给叙利亚政府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增添了重要支持。作为传统盟国，俄罗斯与阿萨德家族长期交好，而叙政府也为俄在地中海东岸的军事存在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在叙利亚的政治、军事布局是俄突破西方对其战略包围的重要一环，不容有失，这也是莫斯科决定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根本原因。

然而叙政府军的行动极大地刺激了反对派背后的主要支持力量——美国。在美国看来，叙利亚的反阿萨德力量构成主要分为三部分：政治反对派、武装反对派，以及少部分极端宗教势力。政治反对派由于缺乏军事支持，在内战及叙利亚权力重构进程中话语权有限，美方对其并不寄予厚望，更多的是给予立场上的支持；少数极端宗教势力由于与恐怖组织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在部分场合并肩作战，美方对其态度亦以打击、反对为主；而最为广泛的武装反对派，既有相对有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能够有效地打击阿萨德政权的执政基础，同时又可以在未来的权力重构中实现话语权最大化，而其相对开放的政治立场、与恐怖组织有所区离的意识形态，深得美国的青睐，自然也成为美在叙战场上的最佳盟友。

地区力量各有盘算

作为对叙局势有着深刻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传统西方盟友一方面与美国相互呼应，另一方面也都各自盘算如何在大国角力的间隙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沙特都是当下阿拉伯世界最具实力的力量。从宗教、政治制度、地缘政治等各个角度来说，沙特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都可谓针锋相对。诚如沙特政府多次表态，其绝不会允许阿萨德政权继续主政叙利亚。特别是在伊朗恢复地区影响力的背景下，对什叶派掌控下的叙利亚予以痛击，对沙特而言是必然选择。然而，即便沙特可以无视阿萨德政府，但仍需要与俄罗斯保持适当的合作关系。在油价低迷、经济状况吃紧的当下，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完全闹僵不利于其国家利益。沙特在诸项关系中艰难寻求平衡，自然也就不能完全顺从其盟友美国的中东战略意图。

对以色列而言，叙利亚战局的关键是伊朗今后在本地区发挥的作用。无论谁主导今后的叙权力重构进程，以色列绝不可容忍伊朗在本地区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与美国和沙特的战术目标相一致。然而，以色列最为关心的依旧是遍布于其北部边境的反以势力，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而并非搅动地区局势的“伊斯兰国”。因此，以色列更青睐对叙内战进行自卫性及预防性介入，这限制其成为相助美国叙利亚政策的完全帮手。

对土耳其而言，叙利亚局势对其国内安全、边境平稳、树立地区影响力都有着重要意义。大量的难民涌入让土耳其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也骑虎难下，难民问题既可以成为其与西方谈判的重要筹码，同时又对其国内安全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土边境的库尔德问题在叙战局升级、地区政治版图破碎的背景下更显棘手，如何在打压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同时开展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民兵的军事合作成为了安卡拉的一大棘手课题。作为北约在中东地区的唯一盟国，土耳其本欲借西方力量树立其在中东的大国影响力；然而七月中旬突如其来的政变，使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受挫，却为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带来转机，中东同盟关系变化更加扑朔迷离。

对奥巴马政府而言，本想安安稳稳地度过其最后的任期，精耕“伊核协议”这一其任期内中东政策的最大成绩，避免卷入愈发胶着的叙内战泥潭，然而却“树欲静而风不止”。

缓解当下的叙利亚局势，并非需要寻找一支具有足够影响的力量；恰恰相反，有关各方务须暂收锋芒，避免过度搅浑本已难解难分的地区乱局。从军事角度，以美俄为主的域外大国为叙利亚输送了过多的武力；从民族宗教角度，沙特、伊朗对内战各方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从地缘政治角度，土耳其的一举一动对战局的演变可谓举足轻重。当下持续不断的内战正是由于各方都极力将自身的政治意图强加于叙利亚的权力重构进程，导致形成了多方势均力敌、对峙抗衡的态势。事实上，频繁而又残酷的军事行动并不能带来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些行动的背后隐藏的是各方日趋膨胀的政治野心。和解进程的路在何方？待各方对利己的诉求都有所收敛，才有可能使夹缝中的小路最终成为通向和平的坦途。

热点透析



满目疮痍的阿勒颇

大选之后：美国政策变化与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座谈会综述

□ 史小今

2016年11月13日，中央党校战略研究院和中央党校报刊社举办“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座谈会。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周琪院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倪峰副所长等专家参加会议并发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刘建飞副院长作总结发言。座谈会就大选结果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未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转向、中美关系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对中国应对提出了建议。

大选结果将对美国政治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与会专家认为，此次美国大选将对美国未来政治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特朗普的获胜颠覆了很多人对美国意识形态版图的认知。由于共和党还占据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未来预计特朗普会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个人计划。奥巴马医保、同性恋婚姻、持枪权等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政治遗产有可能荡然无存。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的政治纲领将很难契合，由此会导致美国政府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出现一些断裂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对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从国内来看，大选造成了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撕裂。种族主义问题严重，美国社会未来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成为未知。根据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可以判断，未来美国政策可能会更加立足于国内，优先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以实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诺言。

与会专家认为，此次选举对美国将会产生长久的影响。此次大选造成的美国的分裂不会因为选举结束而弥合，反而可能会更加激烈，成为一个持久的现象。新政府执政初期，共和党内部将会进行非常尖锐的磨合；未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将面临重组的问题；美国的种族关系还将更加恶化。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转向

与会专家认为，由于特朗普本土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未来其外交政策将会在延续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缩。

首先，美国将放弃TPP。目前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放弃TPP项目，这使得其盟国非常担忧，也使得日本、韩国等在亚洲地区非常依赖美国作为其安全保障的国家坐立不安。亚洲地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国家，未来可能会更多转而向中国靠拢。这将很有可能改变亚洲格局。

其次，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可能会有限度地继续推进。美国将不会加强与其传统盟国的关系。这虽然对中国是利好消息，但是由于中美之间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因此不能认为其完全对中国有利。

再次，会加大打击ISIS的力度。正如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到的，美国将加大对ISIS的打击力度。同时由于在反恐上的统一战线，俄美关系将很有可能回暖。

最后，将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排，增加国会军费开支。

中美关系震荡后会回归常态

与会专家指出，从历史上看，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几经起伏，但总体向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应不会改变，在经历过渡期的震荡后会回归常态。具体而言，中美关系的走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过渡期内中美关系恐会震荡。鉴于特朗普毫无从政经历，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好一时难以把握。同时，特朗普对于中国的外交原则、策略等也需要时间来认识，因而双方的战略磨合期将会较长。在此期间，双方会不断对对方外交政策的边界与底线进行试探，过渡期双边关系因政府换届而产生的周期性震荡可能性加大。

二是中美贸易领域的博弈将会加剧。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就业转移、国债等问题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点，但不会引发贸易战。从特朗普的对华言论来看，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是核心焦点。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同时也是在其总统职权范围之内可以便宜行事的政策领域，特朗普恐将会在汇率问题、关税问题等对华发难。但是，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深入交融，可以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施以重压，短期之内恐能承受，但长期下去必然两败俱伤。特朗普注意利益分配，强调利益为先，将会对中美经贸领域的问题与争端作出妥协，中美引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是中美安全领域的竞争更为突出，规则权博弈暂居次席。虽然特朗普并没有表露出要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关注不仅在于其个人意愿，更在于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紧迫性。从重要性上来说，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亚洲经济一枝独秀，潜力巨大。特朗普强调要倍增美国经济，这必然要深度融入亚洲经济。从紧迫性来说，亚洲地区是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挑战，中国发展以及地区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期待都将使得美国要继续在该地区保持影响力。从方式上来看，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加大在军事上的重返力度，美国的地区联盟关系会有所变化，但绝不会弱化。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将更多体现在实际利益方面，对于规则权之争恐会暂居次席，中国的岛礁维权压力可能上升。

四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回归。未来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会继续增加，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会继续发生变化。但两国都把精力主要投入到内部事务上，因而双边关系可能会在过渡期的震荡后经过回调进入常规发展轨道，即重回中美竞合型关系。这种关系将呈层次性分布：贸易领域竞争加剧、安全领域竞争可控、价值观领域博弈减轻、国际议题合作继续探索。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的形态取决于两国力量对比变化与战略管控能力。

对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就中美关系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与会专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专家认为，虽然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仍然需要有战略定力。目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应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双方合作之中。目前，中国首先要进行摸底，全面了解特朗普未来的班子成员的基本情况和对华的观点态度。同时积极工作促使中美已经达成的协议和共识继续推行。

刘建飞在总结发言中说，判断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还要把握一个基本点：即美国所有的政策都是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而与中国对抗并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未来中美之间并不必然出现冲突，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我们应该冷静观察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做出积极姿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会议综述

《巴黎协定》生效及其影响

□ 柴麒敏

2016年10月5日，欧盟及其七个成员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了《巴黎协定》批准书。至此，《巴黎协定》缔约方数量达到74个，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比重达到58.82%，满足了《巴黎协定》的生效条件。作为《巴黎协定》的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即生效条件满足后第30天，正式生效。

《巴黎协定》是历史上最快被批准生效的国际条约，彰显了全球各国低碳转型的决心。《巴黎协定》得到了全球各国的广泛支持。2015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主席国法国邀请了超过15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开幕式，为多边进程注入动力，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在《巴黎协定》成功达成之后，2016年4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巴黎协定》签署仪式，175个国家或地区派遣了高级别代表参与仪式并签署了协定，其中15个国家提交了批约文书，并且很多国家也表达了尽快批约的意愿。以往达成的国际环境协议大多需要十几个至几十个月的时间来完成生效程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历时22个月生效，《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程序更耗费了长达86个月的时间。此次，《巴黎协定》达成后仅用了不到11个月的时间就正式生效，得益于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更加广泛深刻，体现了各国携手推动低碳转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信心。

《巴黎协定》快速生效离不开多方促进和大国引领，推动形成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巴黎协定》达成后，各方开展了积极行动推动其尽快生效。潘基文分别于4月和9月举办了关于《巴黎协定》的高级别签署和批准活动，并多次在各种场合敦促和鼓励各国尽快批准协定，加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美国奥巴马总统也积极促进《巴黎协定》生效，在其2016年以来的历次国事访问中都与相关国家达成了共同促进协定生效的共识，美国国务院也在各种多边、双边场合积极运作，促进各方批约。中国在《巴黎协定》生效进程中，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在G20峰会期间与美国共同交存批约文件迎合了各方预期，并带动了更多国家批准《巴黎协定》，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摩洛哥、新加坡等国于9月21日在联合国秘书长举行的高级别活动上批约，印度、加拿大、新西兰等于10月初批约等；与此同时，G20峰会期间中美共同递交批约文书是“主场外交”的重要体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作为峰会十大成果之一，各方对此积极评价，这无疑是中国进一步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央的坚实一步。基于国内坚实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基础以及积极建设性的多边和双边气候合作，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巴黎协定》提前生效使多边进程面临一系列程序问题，给协定后续的规则谈判带来挑战。按规定，第一次《巴黎协定》缔约方大会就将在协定生效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期间举行，即2016年11月7日开始的马拉喀什会议。而按照德班平台谈判最初的设想，新协定应不晚于2020年生效，根据以往的经验，在2020年生效的可能性最大，各方也据此对后续谈判进程做出了安排，包括一系列需要在第一次《巴黎协定》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的技术细节和规则指南谈判等。《巴黎协定》提前生效带来一些法律和程序上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未批准《巴黎协定》的《公约》缔约方将无法参与协定下的管理、监督和决策过程，依据先例，上述缔约方只能作为观察员参加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CMA）及相关谈判。《巴黎协定》生效后，CMA作为其唯一的决策机构还需与目前《公约》缔约方会议（COP）、附属履行机构（SBI）、附属科技机构（SBSTA）和《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下的相关工作进行协调。2016年5月波恩会议期间，各方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部分缔约方和秘书处提出若协定提前生效，则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CMA1）在开幕后随即休会，待后续《公约》缔约方大会时继续，但各方尚未就此达成共识，有待第一次CMA大会解决。同时，《巴黎协定》实施相关各议题的谈判也面临更加紧迫的时间约束，第一次APA会议各方仅就会议议程达成共识并初步交换意见，后续谈判仍任重道远。

中国应依托现有工作基础，继续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制定公平、合理、共赢的国际气候合作规则。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都采取了有力的政策措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也进一步提出了有力的行动目标，为落实《巴黎协定》，中国还将在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低碳城镇化和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等方面开展大量的行动。中国率先批约、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显示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转型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积极信号将进一步激励全球各国、私营部门以及民间团体转变经济增长和生活模式，推动各方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落实《巴黎协定》和各自国家自主贡献，促进全社会的低碳转型。这些积极行动也奠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基础，中国应把握机遇，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为抓手和突破口，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中国新形势下对外工作打造更好的基础。

环球瞭望